

郭沫若创作论稿



郭沫若先生

傅 正 乾 著

郭沫若创作论稿

青海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创作论稿

傅正乾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8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7.424

定价:1.00元

序

DC53/26

郭沫若同志是世所公认的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他以青年诗人的身份进入社会，一步踏上革命的道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跨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不断的战斗实践的检验，成为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卓越贡献，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他毕生为革命鞠躬尽瘁，不畏强暴，不避艰险，当北伐的胜利果实被篡夺叛卖之际，他挺身而出进行揭发控诉，大义凛然，使举世为之震惊；他不但坚决地跟国民党反动派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更大大地鼓舞了许多革命青年和有志之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八一”南昌起义，他抱病参加，长途跋涉，不辞艰苦；失败后流亡日本，虽然身处异域，依然胸怀祖国的前途，除了随时就近扶植留日革命青年，对于国内的进步文化活动，也积极支持并经常给予指导。抗战发生，他毅然回国，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组织和团结各界正义爱国人士，一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进行口诛笔伐，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斗志；胜利后继续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同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内战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建国以后，他担负重大的国务活动，领导科学文化工作，功绩显

著，因而受到广大人民普遍的崇敬。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狂肆虐，此时他同样受到种种无情的迫害，但他始终不渝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革命真理，坚持党性原则，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心耿耿，不屈不挠；最后“四人帮”终于垮台，他和千百万人民同声欢呼。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心永远向着党，向着革命，向着人民，他的思想感情永远与革命人民连在一起。

有人认为郭沫若流亡海外十年，是他的沉潜时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青年时代起，他写作总是为了革命，革命决不放弃写作，二者向不偏废。他握笔就是进行战斗，他的笔便是他的武器。即以海外流亡时期而言，他并不是在千叶胜地、銚子海滨韬光养晦，而是一面从事创作和宣传革命文学理论，一面大量翻译各国进步文学作品，夜以继日，手不停挥，成果累累，众目共睹。最令人瞩目的还是这期间他在学术研究上努力攻关，诸如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莫不兼搜博览，屡有新见，其成就的突出，使邻国众多的著名学者大为叹服，连见多识广的日本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都为之咋舌，说一位年仅三十岁的中国学人，在短短的时期内就能作出如此卓越的业绩，简直堪称奇迹。这类称誉，得来也不是出乎偶然，由于他自幼勤学苦读，积累相当丰富，基础比较深厚，且以天资颖慧，往往能过目成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目光犀利，视野宽阔，所以涉及面广，接触度深，从而获得不少难以企及的硕果。当然，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所有成果，也并不全部是无懈可击的，限于主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有重大价值的资料，或者尚未发现，或因受限制不易见到，他不可能使他的研究工作超越他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有些地方失之粗疏或者不够贴切，是在所难免的，但他的勇于闯新、敢于创造的

精神，特别是为了寻找真理而无所畏惧地拿起唯物史观这一伟大武器来从事大胆的尝试，开拓了我国学术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等方面研究的新阵地，其功决不可磨灭。

目前有些人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持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要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理所当然地允许对它进行评论。我自知才识谫陋，不敢妄参末议，但我愿意在这篇短文里，对他的思想发展的道路，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般认为，郭沫若的思想发展，是从泛神论进入唯物论的，这大概不能视为无稽，因为他从庄子、屈原乃至歌德、雪莱、泰戈尔等东西方重要作家接受了泛神论思想的一定因素，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历历可见，特别是从他所精研的歌德的《浮士德》中，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影响，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歌德素有“诗的斯宾诺莎”之称。斯宾诺莎这位杰出的荷兰哲学家，是著名的泛神论和无神论者，由于他的自然观已进入唯物主义的范畴，因而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但人们公认他的社会观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那正是十七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映。郭沫若开始间接从歌德、直接从斯宾诺莎本人的著作中接受了他的泛神论思想，接着又对它表示怀疑，从而进一步加以探索，因而可以说，郭沫若的思想，就在青年时代，也已超过了斯宾诺莎和歌德。此后在一九二四年，郭沫若着手翻译了日本早期的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部巨著，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认识上有了飞跃；但仅仅依靠一部书的翻译，就能根本转变世界观，通常认为那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不失为转变的一个契机，却也用不着硬要加以否定。由于他留学日本时精神上备受欺凌，眷怀祖国，憧憬光明，可是回国后目睹广大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种种惨

状，更加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其时正值国内反帝、反封建运动怒涛澎湃，他便慷慨悲歌，投身戎伍，从此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受了种种考验，终于在起义途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战士。所以我认为他的思想发展的道路和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以科学民主为推动力，以社会主义为核心，最后归结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归，是旗帜鲜明、坦荡前进，纯粹是出自主观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并不是被“逼上梁山”的。

最后，关于郭沫若在文艺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尤其值得大书特书。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多少财富，为祖国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多少珍藏，几乎难以估计。我认为，他之被世人普遍敬仰，交口称誉，大半也都着眼在这一方面。目前，郭沫若研究正在逐步展开，比起其他方面来，文艺工作的研究成果也许更多些，但这些成果，与他的丰功伟绩相对照，差距还是很大，远远不能相称。如所周知，他是开一代新风的伟大诗人，也是开一代新风的戏剧大师，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崭新的篇章，占有崇高的地位，但由于他的作品博大渊深，万理森著，润古雕今，征引详赡，因而真正能够对它们追本穷源，烛隐显微，指出其中奥义，阐明它的真谛者，殆亦不甚多觐。所以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个起步，要求不断深入，继续提高，还得大大地加劲哪！何况他在文艺创作上，面也很广，品种也不少，诸如小说、散文、传记文学等等，不但数量很大，丰富多采，而且往往能独创一格，别具新意。还有大量的翻译，古书今译如《卷耳》、《屈赋》等等，外国作品更加多样，从德国的乡土文学《茵梦湖》、爱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世伊朗的抒情诗《鲁拜》开始，继之以席勒、海涅、拜伦、雪莱，直

至高尔斯华绥、约翰·沁孤、辛克莱以及《新俄诗选》等等，凡所译介，几乎时贯古今，地遍全球，它对于我国接受世界先进文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汲长绠短，互为影响，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对于这些方面，迄今也还少有人给以充分注意。特别是对《浮士德》这部杰构，据说从歌德写初稿直至完成，历时凡六十年，郭沫若翻译此书，从开始着手到最后定稿，也经过三十年时间，那么我们仅仅要对它认真钻研，至少也得花十五年的功夫吧。此外还有郭沫若的文艺理论，历来争议最多：他究竟属于浪漫主义还是属于现实主义？究竟是为艺术的还是为革命、为人生的？究竟以单纯追求艺术趣味为主还是竭力重视社会效果？他如何把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熔铸于一炉？他如何接受并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最后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的创作巨匠和理论大师？……凡此种种，众说纷纭，有待我们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深入探索，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各抒所见，共同提高，作出结论。

傅正乾同志是郭沫若的忠实崇拜者，若干年来，他虚心学习和研究郭沫若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孜孜矻矻，颇有心得。我曾数次在不同地区举行的纪念郭沫若的学术讨论会上听到他的精彩的发言，也曾在若干报刊上读过他的深有体会的文章，觉得他对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思想发展，能够多方兼顾，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而且持论公允，不乏新意，尤为难得。最近他把近两年所写的十一篇研究文章，分为三组，集为一册，命名为《郭沫若创作论稿》，即将付梓。他要我为这部新著写篇序文，我因有感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的忠诚以及他对当前推进郭沫若研究不辞辛劳所献出的力量，未敢故拂雅意，爰缀数语于卷端，希望它在行销全国之际，与各方有识之士互相切磋讨论，使郭沫若研究从而更得到普及提高，

并热烈地期望傅正乾同志继续鼓足干劲，百尺竿头，勇攀郭沫若研究的新的山峰。

孙席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郭沫若的创作道路·····	(1)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8)
郭沫若史剧理论初探·····	(71)
郭沫若前期的诗歌创作与泛神论思想·····	(90)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及其描写领域·····	(132)
试论郭沫若历史小说的创作艺术·····	(156)
郭沫若历史悲剧散论·····	(171)
试论郭沫若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204)
试论郭沫若的传记文学·····	(226)
郭沫若与鲁迅的革命友谊·····	(261)
——从郭沫若步鲁迅诗韵写的几首诗谈起	
《女神之再生》与《补天》的比较研究·····	(277)
后记·····	(291)

郭沫若的创作道路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既是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对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的一生波澜壮阔，著作等身，其文字生涯长达六十余年，笔者实难一一尽述，好在有他的《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和《洪波曲》等传记文学作品可资研读。本文着重按照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对他的创作道路作一些论述。

在中国新文学诞生的狂飙突进的年代，郭沫若以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诗人的战斗英姿登上了“五四”新文坛，而他的诗歌的“修养期”^①却是从他的摇篮时代就开始了的。

郭沫若名开贞，字鼎堂，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大渡河畔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这个家庭虽不是

^①《离沪之前》，《沫若文集》第8卷第281页。

世代书香，但父祖辈也都是读过书的。特别是他的母亲杜邀贞，资质聪明，多才多能，虽未进过学校，却能背诵许多诗词。郭沫若还在发蒙以前，母亲就教他诵读“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一类的旧诗。他后来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与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姓杜，她长于刺绣，对于诗歌有偏爱。在摇篮时代一定给我们唱过催眠歌，当然不记忆了。但在我自己有记忆的二三岁时她已经把唐人绝句教我暗诵，能诵得琅琅上口。这，我相信是我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①

1897年春，郭沫若还不满五岁，即入家塾读书。在塾师沈焕章先生的教育下，他白天读经，夜间读诗。虽然他觉得读经不如读诗有兴趣，但熟读了《易经》、《书经》、《周礼》、《仪礼》这些古书，却为他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在诗歌方面，他熟读了《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特别是高古的唐诗给了他莫大的兴会。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等人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使他深深地感受到诗的美。他后来说：“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②

在慈母、严师的影响和教育下，郭沫若在幼年时代就受到古典诗歌的熏陶，并初步地具备了用旧诗来写景抒情的能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郭沫若最早的诗作，是他1904年前后写的一首五律《邨居即景》：

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

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

① <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沫若文集》第13卷第131页

② <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沫若文集》第13卷第132页。

牧童横竹笛，邮媪卖花钿。

野鸟相呼急，双双浴水边。①

这首处女作描写了峨眉山下、大渡河畔山村水乡的绮丽风光，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天真活泼的生活情趣；无论写景状物还是遣词造句，都无不表现出这位未来的大诗人早年的创作才华。

郭沫若的少年时代正是清朝统治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旧民主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正在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庚子（1900年）事变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缓和国内人民的革命要求，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变八股为策论，接着又废科举而立学校。当时正在新式学堂读书的郭开文（郭沫若的大哥），经常购置一些新的书刊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浙江潮》等寄回家来，郭家的家塾——绥山馆也流入了新的风气，而主持这个家塾的沈焕章先生，既有旧学的根基，又有接受新学的魄力，便在家塾里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郭沫若在家塾里除攻读经书以外，还接触到一些介绍世界形势和民主启蒙思想的书刊，学到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同时，他大哥还鼓励他将来学实业，认为实业学好了就可以富国强兵。在这种环境下，富国强兵的旧民主主义思想给郭沫若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

1906年春，郭沫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嘉定（即今之乐山县）小学。由于这个学校的教师多数不能胜任新式课程如数学、物理等，郭沫若在这里没有得到多少新学的教益，但是“读经讲

①《郭沫若少年诗稿》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经”却成为他“最喜欢的一门功课”^①，这是使他“和旧学接近的一个因素”^②。加之嘉定山水秀丽，他在假日经常到青衣江北岸的凌云山、乌龙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里感到葱茏的诗意，大有追步苏东坡之感。更兼他这时读了《西厢记》、《月花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便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③。

1907年秋，郭沫若小学毕业，升入嘉定中学。这个学校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物的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讲国文的不知道“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成“盼望你们诸君”^④。由于教育的腐败，教学内容“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他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从而形成了他“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⑤。1910年春，郭沫若又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辛亥革命前夕，一些稍谐人意的教师都转入政界，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他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却广泛地涉猎了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红楼梦》、《水浒传》等，并阅读了“林纾译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和“章太炎的学术著作”^⑥。而林译小说对他的影响不仅及于他的文学道路，而且及于他的文学倾向。他曾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通译为“司考特”——引者）的

①《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第7卷第4页。

②《我的童年》，《沫若文集》第6卷第64页。

③《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第7卷第5页。

④《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第7卷第5页。

⑤《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第56页。

⑥《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第7卷第6页。

《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指示给我了。我受 Scott 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①

在中小学阶段，郭沫若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积极反抗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和参加“国会请愿”的斗争，被学校斥退（即开除）过三次。这初步地显示出他的叛逆性格，说明他后来能成为一个富有叛逆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决非偶然。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曾给年轻的郭沫若以巨大的鼓舞，他认为“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②然而革命后的混乱局面却给他带来极度的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飞向远方的愿望和决心。

郭沫若的诗的“觉醒期”，是从他留学日本开始的。

1913年底，郭沫若离国经朝鲜，在釜山迎接了1914年的新年，然后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他之所以选择医科，“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③。但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④时时感受到军国主义的欺凌，进一步增强了反帝爱国思想。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曾同几位留日同学回过上海一次。当时，他愤笔写了这样一首七律。

①《我的童年》，《沫若文集》第6卷第114页。

②《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6卷第193页。

③《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第7卷第10页。

④《三叶集》，1920年2月3日致宗白华信。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这首诗与鲁迅的《自题小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表达了郭沫若的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感情，他返回日本后，就更加勤奋学习。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切实掌握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日语、德语、英语、拉丁语，于1918年夏考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郭沫若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是文学，到日本后他决心抛弃文学，致力于医学的研究，但是日本人教外国语都用文学作品作教材。因此，他在高等学校或大学期间，便不期而然地与印度文学、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阅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从泰戈尔、海涅、歌德、惠特曼、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里吸收了多方面的滋养；同时也间接地接触了法国文学、俄国文学。这就使他早年种下的文学的根，又不知不觉地发出枝干来，以至把刚刚生长起来的医学的嫩芽掩盖了。他曾立志学医，而终于会走到文学的道路上来，据郭沫若自己说：除“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先生在台上讲课，我便在台下看小说。有时灵感一来，我便动笔写诗”这一原因外，“由于听觉不灵，不能掌握听诊的微妙的基本医术”^①也是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他朦胧地反对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思想觉醒，使他想利用文学的力量“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②。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在这儿应该感谢

①《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5月号。

②《郭沫若选集·自序》（开明书店版）。

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①

郭沫若因为喜欢泰戈尔的诗，又喜欢歌德的诗，因而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了。具体地说，他由泰戈尔而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皮尔，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现通译为《奥义书》）的思想；由歌德而认识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并阅读了他的哲学著作（如《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从而接受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同时，和外国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他又把少年时代所喜欢读的《庄子》的思想再发现了。郭沫若就是集这三方面的哲学思想，经过自己思想熔炉的冶炼，形成了他本人的泛神论思想。

为什么郭沫若当时能够接受泛神论哲学思想的影响呢？

西欧的泛神论哲学产生于古代意大利的爱勒亚学派，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是一种披着神学外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文艺复兴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和斯宾诺莎是泛神论哲学的代表。这种哲学思想否定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即所谓“本体即神，神即自然”。它主张从世界本身去说明世界，提出了“实体自因”的观点。这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鲜明的反对“上帝创造一切”的作用。而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冲决一切罗网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已成为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成为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愿望。泛神论思想又恰恰和诗人这种愿望相吻合。这就是郭沫若之所以能够接受泛神论思想的主要原因。当然，郭沫若在接受泛神论思想的唯物主义成分时，也接受了它的唯心主义因素。由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当时正处于形成期，所以泛神论的思想、观点还没有在他的诗作中明显地表现出

^①《郭沫若选集·自序》（开明书店版）。